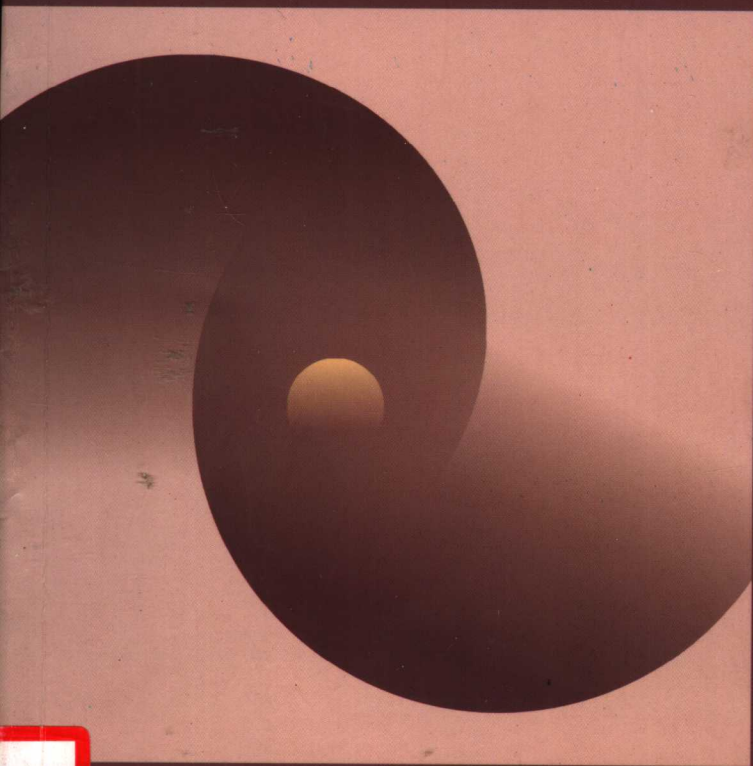


郑
湧
◎
著

道，行之而成

走出书斋后的哲学沉思



郑湧, XIENGZHI
CHENG
ZOUCHU SHUZHAI HOU DE
ZHEXUE CHENS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行之而成

走出书斋后的哲学沉思

郑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 行之而成/郑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

ISBN 7-5004-4558-X

I. 道… II. 郑… III. 哲学-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440 号

责任编辑 艾 智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21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对于哲学，哲学家们经常提一些非常大、非常抽象的问题，这类大而抽象的问题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距太远，就只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结果往往是作茧自缚，最后就变成了哲学家们给自己出的一道无法解答的难题。

反倒是那些贴近实际生活的哲学爱好者，往往根据生活实际的感受凭着感觉看待哲学，却反而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哲学。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朋友，她说，她喜欢哲学，经常看一些哲学书，后来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在地球以外的另一个星球上看地球；而在学哲学之前，自己是在地球上地球。

普通人是如此，大科学家也是如此。牛顿不就是看到树上的苹果落地，突然受到启发，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吗？这类事例并不少见（科学之外、哲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会推动科学的伟大发明创造，无疑也会推动哲学的伟大发明创造。

搞科学也好，搞哲学也好，重要的正是要从日常的实际生活中找到这类感觉，能够跳出原有的局限，跳出科学之外，从科学之外来看科学；跳出哲学之外，从哲学之外来看哲学。这种感悟与境界，正如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所描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山是如此，看哲学也是如此。看哲学，不能在哲学里看，而要从哲学之外看。

这些年来，我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这在哲学上，能够导致一种回溯、一种对抽象的克服），根据切身感受，跳出原有的局限，努力从哲

学之外来看待哲学。在本书中，我立足于把做事与做人、做学问等在哲学意义上严格区别开来。或者说，区别于做人、做学问。

在本书中，我把哲学思考的侧重点放在做事上；我甚至于把哲学工作者看作首先是做事的人，因此哲学思考应该主要是针对做事的特别是自己所做的事，所引起的哲学沉思。本书，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事的哲学沉思，讲的是一种做事哲学。这样一种做事哲学，主要不是讨论做人，所以不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主要不是讨论做学问，所以也不是知识论、科学哲学之类；更不是讨论艺术或其他虚构的世界的，自然也就不能算是艺术哲学、美学。

从1986年到20世纪末，可以算作我的哲学工作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了十多年之久。如果用简单几句话对这个阶段来作一概括，可以说是：通过与德国当代哲学家H. - G. 伽达默尔(H. - G. Gadamer)相识和走出哲学研究所两件事，我从师法传统转向师法造化(如实际的人生)、从哲学走向了前哲学的生活世界，摆脱了书本之《易》的束缚，直接面对、直观并理解“自然之《易》”。对于这些往事，本书打算做一个回顾和小结。另外，对于这样一种往事的回顾，我比较侧重于回顾这些往事的突如其来、自己突然显现、意外遭遇，而不是人为的设计或揭示。

对于往事的回顾，就不再是往事本身，不再是那实际发生的往事本身，而是对已发生的往事的回忆、追溯、思考、说或写。如果，以存在与思维来作出规定与区别；那么，那些实际发生的往事本身是存在，而那些对已发生的往事的回忆、追溯、思考、说或写，则属于思维或是思维的表述。存在与思维，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而思维又往往以存在为基础。往事一去不复返，不能再被看到，也不再可以直接地被体验到，不可能再次去“过”；只能以回顾来追忆，这种追忆是“想”、“说”或“写”，而不是如当时那样的“过”。在这样一种“想”、“说”或“写”中的往事，也不会是往事的自己显现、如实再现。我仅求借助回顾、借助语言文字，使我上述十多年的生

活、生存历程得到某种程度的展现与理解；更有所期待的是，在这种展现与理解的同时，有些求之而不得的极其宝贵的东西会意外地、突然地显现。借助语言文字使生活、生存、生命的事实得到某种程度的展现与理解，是解释哲学要旨所在。不过，我和解释哲学也有一点区别：在这里，我打算做的是一种对往事的直接考察，而主要不是对往事考察的考察、解释的解释。

往事，是“过去”的事，所以人们称之为“古”（或“故”）事。“古”字有“口”，说明这种“过去”的事是一件不断被人惦念、唠叨的事，尚不是被人遗忘了的事，但是，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遗忘、遗忘的总是要比记住的多得多，而且偏偏是在人们如何想方设法记住什么时候遗忘，特别是遗忘了那些本不该遗忘的东西、那些最为重要乃至是生命攸关的东西。所以，记住的东西往往是少而又少的、一鳞半爪的、残缺不全的。记忆，犹如瞎子摸象，不可能获得象之全貌。这样一来，对于往事，人们试图以记忆求全，而最终却以遗忘或残缺。因此，区别于求全，应该给残缺、守缺、求缺以一个重要的位置。从这一方面来看，由残缺而产生的守缺、求缺，就带有一种存在性、根本性。如果说，哲学是追究终极、追究根本的；那么，这种遗忘、被遗忘的生命攸关的东西和记忆的残缺性，也是哲学所要追究的一种终极和根本。从哲学上来讲，这是一种求缺论，以此可以纠正哲学上的求全论（如总体论等）的偏颇。在当代的西方哲学界，K. 波普尔（K. Popper）主张的证伪论可以算是一种求缺论，而 H. - G.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因其带有明显的总体论（Totalitaet）倾向，所以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求全论。在德文中，总体论（Totalitaet）这个词的词根是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相同的，因而带有某种政治相关性。

另外，即便就往事本身而言，也从根本上带有一种残缺性，正如苏东坡在一首词牌为《水调歌头》的词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自古以来，不论是人世间还是自然

界，诸事难全。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两种残缺性：一种是往事本身的残缺性；另一种是对往事记忆的残缺性，对往事的回顾、记忆、记录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残缺性。由此而来，对往事以及对往事的回顾、记忆、记录的哲学思考，都应该“抱残守缺”，提倡求缺论，而不是求全论（诸如总体论等等）。坚持“抱残守缺”，提倡求缺论，就能保持宁缺毋滥。而凡事求全，坚持求全论，就会弄虚作假、以假乱真、以讹传讹，以高、大、全为名，行假、伪、劣之实。与这样一种求缺论相近的，是 K. 波普尔的证伪论，它的侧重点在于：发现和消除错误。K. 波普尔说：“我们怎样才能有希望发现和消除错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通过批判他人的理论或猜测以及——如果我们能学会这样做的话——通过批判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 页）而发现和消除错误又是非常有限的，错误往往不能全部被发现，又是无法清除干净的；所谓的对错误的发现和消除，不仅是有限的，并且就在此发现和消除的同时又出乎意料地产生着新的错误。

记住并传播往事，可以用“口”。“古”字为“十”“口”，古事、故事即是十口相传之事。“十”为“众”，如果是“众”“口”相传，可以传播广泛而且久远。另外，也可以把它们“写”下来，成文章，或为史册；若为史册，便是“历史”。“写”下来形诸于文字，更便于保存和流传。往事就在这样一种相传中被记忆、保存；但是，必须提请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记忆、保存是很难准确、完整的。之所以如此，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外在的原因，如司马迁想秉笔直书，惹恼了汉武帝，被惩之以阉。有的原因则是内在的，如叙述记载者的立足点、观念不同，对同一个事实的叙述记载就不同，一千个叙述记载者就有一千个不同的叙述记载。还有叙述记载者的记忆、保存能力的有限，叙述记载的被毁坏、遗失，等等。这些，都会导致叙述记载的残缺不全、错讹谬误。以这样一种残缺不全、错讹谬误的记住为基础的传播、流传的，也一定会产生以假乱真、以讹传讹；那

么,最终能留下多少真实、正确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

做小结,也是一种记忆、保存的方式。人们往往是想用这样一种小结来保持、传播真实的东西和真理;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记忆、传播与事实、真理相联系。而我在本书中要着重思考和指出的,恰恰相反,是记忆、传播与残缺不全、错讹谬误的关系,是记忆、传播的残缺不全、错讹谬误的必然性。当然,在本书中,我尽管是在竭力指出并纠正记忆、传播的残缺不全、错讹谬误,而我这个指出与纠正本身也仍然难免带有记忆、传播的残缺不全、错讹谬误。

做小结,往往是通过“说”或是“写”。小结所要“说”或是“写”的往事,可以是过去的“说”或是“写”,因此可以说是对“说”或是“写”的说或写;也可以是过去所做的事,是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行为,因此可以说是对“过去所做的事”的说或写。对“过去所做的事”的说或写,是把“过去所做的事”变成了“说”、“写”,是把“行为”变成了“语言文字”;然而,“过去所做的事”与“说”“写”、“行为”与“语言文字”之间,是很难完全相符的。这样一来,“说”“写”对于那“过去所做的事”就有了一种疏远性、他者性。西文中的“历史”一词为 History,直译是“他人的故事”,就明显地表明了这种疏远性、他者性。本书回忆、论述我的一些往事,也明显地带有这样一种疏远性、他者性;疏远性、他者性,还有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也是本书进行哲学讨论的重要课题。

人们又往往把小结仅停留于“说”或“写”。停留于“说”或“写”,就使这种“说”或“写”更具有疏远性、他者性,也使小结本身带有一种残缺不全、错讹谬误;或者说,是小结本身固有的残缺不全、错讹谬误之一。因为,究其实,人们之所以要说或写,不是为了“说”或是“写”而说或写,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做事;而小结之要“说”或是“写”的,常常是“过去所做的事”;或者说,主要是对“过去所做的事”的说或写;从“过去所做的事”到现在和将来的做事,一以贯之的是:做事。把小结停留于“说”或“写”,正是忽略、忘记了

做事。更何况，除了“说”和“写”之外，保存与流传的方式还可以是“身教”或者说是“行不言之教”，以自己的行动(做事)相传。这样一种以自己的行动(做事)相传，是真传，也可以称之为嫡传，如过去的学艺，再如宗教界的传授，都是如此。

所谓“做事”，最基本的内容是：生存。正如人们所熟知并达成共识的：“民以食为天。”对于人而言，吃饭穿衣以满足生存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说，生存是“做事”之本，是一切“做事”的基础，而其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做事”。当然，做学问也可以算是一种“做事”；然而做学问与生存相比较，却并不是一个重量级、一个层次的事。做学问，是在生存的基础上的，是以生存为基础的。而且，还可以说，做学问也需要在生存中才能进行，例如在生存中学习生存；显然，生存这门学问就得在生存中做，在实际的生存磨炼中做，而不是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里做。对于人生而言，所要追求的真理，最根本的应该是事实(实际生活)的、生(死)存(亡)的真理，而不是那种学问的真理。在这里，我强调了生存与做学问的重大区别，作出了层次、档次的区别，并把生存作为最根本的东西，作为做学问等等诸事的基础、生命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在哲学上，我推崇生存论、存在论，把生存论、存在论与知识论、科学论严格区别开来，把生存论、存在论与知识论、科学论看作是不同的层次、档次的哲学，并把生存论、存在论看作是知识论、科学论之本、之基础。这在本书中有明显的表露。当然，我又并不限于此，努力于在M. 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H. - G. 伽达默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再有所突破；我之所以由生存和生存的境界等进而提出境论，用意就在于此。

还有，要做事，就必须学会面对现实、从面前的活生生的实际出发；就要弄清楚所面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说与做的重大区别。

对往事的说、写所涉及的记忆、保存、回顾与再思考，既涉及过

去;过去的存在,是昔在。然而又不只是过去,也涉及现在,是从现在看过去;现在的存在,是今在。对过去而言,是过去向现在的延伸;对现在而言,又是现在往过去的拓展;也可以说是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是昔在与今在的一种对话,在过去与现在、昔在与今在之间的来往反复。以对话使诸如现在与过去等等二元对立得以沟通,是 H. - G. 伽达默尔在哲学上的一个贡献。然而,在法国哲学家 J. 德里达(J. Derrida)看来,这样一种二元对立是古希腊柏拉图(Plato)所建立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H. - G. 伽达默尔恰恰是继承了柏拉图的这一传统。为了彻底摧毁这个形而上学的传统,J. 德里达借助于解构说力图消解现在与过去、中心与边缘、内与外、主体与客体(我与他)等等一切二元对立。

我们再接着讲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这样一种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是昔在与今在的对话,在过去与现在、昔在与今在之间的来往反复,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时间与空间的重组。不同的时空,会形成不同的看问题的立脚点和角度,从而发现事物的不同真相,形成不同的真理观。所发现的真相的不同、真理观的不同,往往只是所处的时空不同的缘故。时空是多元的,真相与真理观也是多元的。例如,在宏观世界里,I. 牛顿以突出绝对性的力学为真理;而在宇观世界里,A. 爱因斯坦以相对论为真理;另外,对于量子力学而言,似乎又以测不准之类的不确定性为真理。

在这大千世界中,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管窥蠡测;人们所能成就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家之言”。遗憾的是,人们往往过于看重“一家之言”这句话的褒扬之意,并因此而自得。其实,“一家之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涵义,那就是说这个“之言”,只限于“一家”,只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除了这“一家”之外,还有“千家”“百家”;切不可只看到这“一家”,而看不见除了这“一家”之外的“千家”“百家”。切不可“一叶蔽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遗憾的是,许多哲学家一生都在竭力创立“一家之言”,并以

此为最终目的、为最高标准、最大荣耀，从而被“一家之言”所累、所束缚、所局限而不及其余。

还有，上面所说的这样一种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来往反复，往往增添着一些过去与现在原不曾有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增添往往又不是人们所能预料的并且是易被人们忽视的，因此已远不是过去与现在的相加。这样一种回顾与再思考，看似又一次踏入哲学往事之流，实际上并没有再次踏入哲学往事之流。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哲学事件之流。所以，我的这个小结即对往事的回顾与再思考，已经不可能只是一种往事的重复；它必然是对往事的一种拓展、超越。

另外，哲学之流也是不可能被截断的，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因此，我也不可能把某段往事与前后左右完全切断之后，孤零零地端出在读者面前。当然，哲学之流也不能堵塞，而只能疏导。不过，这就有点儿扯远了。

话又说回来。在这十多年之中，有两件事情对我的哲学思考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我的回顾与再思考，着重于这两件事，一件是：相识德国哲学家 H. - G. 伽达默尔；另一件是：走出哲学研究所。这两件事，一件是着眼于实际生活中的 H. - G. 伽达默尔，另一件是思考在哲学研究所以外的活动，看起来似乎都在哲学之外，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哲学意义。相识德国哲学家 H. - G. 伽达默尔特别是那次与他的意外遭遇，重大地改变了我的哲学思路；而走出哲学研究所，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哲学思路。我这个小结，正是试图讲讲我自己的哲学思路和看法是如何改变的；也许，就在这个讲述过程中，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又有了新的改变。

这两件事，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的发生，当时都是在我自己的意料、计划、想象之外的，尽管又都是在我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而恰恰是这些在我自己的意料、计划、想象之外的事情，比那些意料、计划、想象之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更为根

本。由此,我在本书中着眼于对出乎我自己的意料、计划、想象而发生的事情的捕捉、回溯与思考。不过,这样一种捕捉、回溯与思考,很难完整无缺;而且,也就在我的这种捕捉、回溯与思考的同时,会有新的出乎我自己的意料、计划、想象的事情发生;捕捉、回溯,永远赶不上新事物的意外发生。对于人来说,在这一方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我这样做,首先是上述两件事事实如此,是事实使其然。其次,也还有理论方面的参照。正如 H. - G. 伽达默尔曾经说到过的那样,哲学的问题不在于人们想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而是在于除了这些所想、所应该和实际所做的之外,同时又发生了哪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参阅 H. - G.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那些除了所想、所应该和实际所做的之外同时发生了的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些原本存在但又被人们顾及的、被遗忘的事情。而在这些事情中,我在本书中着重重要讨论的是那些与人的生命、生存相关的事(也许是出自叩问哲学生命的需要吧)。这方面的讨论,古人已经做过,并且流传至今。譬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故事的流传如果从庄子算起至少有两千余年了,但是,其中的对于人生的极其重要性和哲学深意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句成语,可以说揭示了人的最大也是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顾此失彼。人们常常是在有所得的时候有所失;过分关注所得的时候,往往会不顾、忘记了其他的事,甚至如螳螂那样不顾、忘记了自己生命攸关的事情,从而就有所失,甚至失去了生命。

当然,要想知道除了这些所想、所应该和实际所做的之外同时究竟发生了哪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不仅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懈怠,还得有能力及时发现并把握住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最终还是未被发现和把握的远远多于被发现和把握住的。未被发现和把握,是一种残缺不全、一种失;但

是，失，并非不重要、亦非一定就是坏事，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而最重要的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失要比得给人以更深刻的教育、对人生更深刻的体验。如果，这些应该是哲学思考的着重点所在；那么，哲学的着重点就并不在于去思考、把握那些按照人们的想象、意图和计划所产生的事情；那似乎应该是科学要做的事情，科学侧重于去思考、把握那些按照人们的想象、意图和计划所产生的事情。

假如，对意料之外的事情再作深一层的哲学思考，就会发现：残缺不全、失，即未被发现和把握，将是重点所在。就人生而言，非常需要学会从遗忘、从失、从残缺不全、从不利处、从隐蔽处、从最难处着眼。或者说，是从人的不足处着眼。从人生的整体来看，任何人都倾其所有、全力以赴却依然是智慧、能力的极其有限；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极其有限，来应对比自己强大得多又根本不成比例的不可抗拒的极富毁灭性的自然力量、面对无法躲避的人世间的残酷争斗；因此，在这些力量面前，人永远只是一个愚者、弱者、拙者、盲者、讷者、败者。所谓智慧、力量、灵巧、光明、善辩、胜利的荣耀，等等；对于人来说往往都只不过是：愚者的智慧、弱者的力量、拙者的灵巧、盲者的光明、讷者的善辩、败者的荣耀（虽败犹荣）而已。

对于那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的哲学思考，如果是从明处和暗处的区分入手，那么，所想、所应该和实际所做的在明处，而与此同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未被发现和把握的则在暗处。即便是思考暗处的东西，也还有思考其显现部分和未显现部分的区分。坚持在暗处，就会保持对于亮点的极其敏感性；在暗处，任何亮点（哪怕是非常微弱、短暂的）一旦出现，就会显露无遗，马上就能被发现。而且，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是未知多于已知，暗处大于明处。即便在明处，也要学会居明思暗。居明思暗，则明；居暗思明，则暗。在哲学上，我认为应该倡导：居明思暗。推而广之，就是：居智思愚，居强思弱，居巧思拙，居辩思讷，居胜思败，居安思

危,居上思下,居进思退……

这样一种居明思暗的想法、说法,也许可以看作是对 H. - G. 伽达默尔解释哲学的一个主导词 *Verstehen* (一般译成中文为:理解)在中国哲学领域内的一种解释和运用吧。*Verstehen* 这个词由 *Ver-* 和 *stehen* 组成,*stehen* 是站立、立足的意思,*Ver-* 有改变的意思,加上 *Ver-*,*Ver-stehen* 就有改变立足点的意思。人们常说:换一个角度,不妨站到对方的立场上,替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个德文词,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能设身处地,就比较容易与对方沟通,容易理解对方;并进而理解自己。居明思暗,也就是说,对于明的思考,也要换一个角度,从明的对立面即暗来看待明。还有,从不懂来看待懂,从未知来看待知,等等。

在这方面,有些哲学家着重思考在明处的事情,比如说,对于那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的自我显现、对它的发现的思考;或对人的自我的发明创造的思考。如 H. - G. 伽达默尔的显现、发现和 F. W. 尼采(F. W. Nietzsche)的发明创造。在这些方面,我的思考重点,既不和 H. - G. 伽达默尔相同,放在那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的自我显现上,放在对它的发现上;同时,也不像 F. W. 尼采那样,放在对人的自我的发明创造上;我侧重于对遗忘和被遗忘的事情的追究,换句话说,是放在未显现、未发现或未发明创造上,可以说是放在与这些显现、发现或发明创造的所得之相反的所失(未被发现和把握的)上,或者说是坚持不渝地、一以贯之地放在暗处。即便是身处明境,也仍然着眼于暗处。如果,以阴、阳来区分, H. - G. 伽达默尔和 F. W. 尼采注重于阳面,即注重显现、发现部分,人的强项和长处;而我则注重于阴面,即注重隐匿部分,人的脆弱、渺小和残缺不足。西方的思想家所说的人的被一分割两半,指的也是人的残缺不全。据他们说,人本来是一个整体,后来被分为两半,分为男女;从而产生了这一半对另一半的永远追求。这样一种追求,是一分为二残缺不全所致。以对这另一半的永远追求,来

揭示和尽可能弥补人的天生不足，成为哲学思考的一个永恒主题。

与此同时，我并不想让自己的哲学思考停留在固有的诸如客体与主体、事与理、过去与将来、时间与空间、发现与发明等等的对峙、差别上；不想二者择一，也不想停留在相关的对它们的是非曲直的评判上。可以说，与这些相比较，我更重视对那种原有的界限的被突破，鸿沟的被填平；换句话说，是对那些对峙、差别的超越，而不局限于、滞碍于那些对峙和差别。比方说，居明思暗、得失相随、生死相依的观念和学说，就是对明暗、得失、生死相分、相对峙的观念和学说的一种超越。我对于那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的哲学思考，把着重点置于前述对峙、差别之外，乃至放到“是非有无”之外。总而言之，我也在努力使传统的哲学上的二元对立得以沟通。

使传统的哲学上的二元对立得以沟通，在哲学史上曾有许多哲学家作出过贡献。例如，西方的后现代哲学着重强调了界限、边缘的模糊性，这也是一种对界限的突破、二元对立得以沟通。其实，这类思想很早就有人倡导过，如 I. 康德(I. Kant)的画面与画框的理论。界限的划分、标示，本来就是相对的。

再说说事与理。事情是事，是既成的事实，是时间地、历史地形成的事实，具有生存论的哲学意义；而看法则是理，是知识，是学问，其本身具有知识论的意义。但是，人们可以不妨一试，从生存论的立场、角度考察一下理、知识、学问。如果，从生存论的立场、角度去考察理、知识、学问；那么，理、知识、学问就成为在生存中对生存的学习、在生存中对生存的叩问，是对生存的直接参与和介入。这样一来，事与理之间的关系，也就超出了以下几种说法所具有的深度和层面：理是事物固有本质的自我显现，理是人们从事物本身得出的，抑或理是人们加到事物身上的人自己的理解、解释、看法，等等。

诚然，事情与看法之间、事与理之间有很多的不同。必然性，

只是对理并且是只在理本身的范围内而言。事情,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往往是超出常理的;而看法未必一定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实际存在的事物。合理的未必存在;存在的未必合理。另外,看法会有对错,可修改;而事情一旦发生,却不可更改,也难分对错。还有,事情的发生往往是意外的、不期而遇的;而看法是针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往往以已发生的事情作依据。再者,事情的发生是非语言文字的,即不在语言文字之中且不受语言文字的限制;而看法往往是借助于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几乎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都还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事情去描述、各自的看法要讲解。再说,某个人认为是真的、合理的,其他人就未必同样认为是真的、合理的;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与此相反,就有点儿不正常了,例如一言堂、众口一词,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看到本书的人便会知道:对(我的)事情经过(也就是说,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生存经历)的描述,是在语言文字中进行的,换句话说,(我的)事情的经过是被话说出来的、被文字写出来的;至于讲自己有关的看法,也是借助语言文字得以进行的,(我的)看法也是被话说出来的、被文字写出来的。(我的)事情,是语言文字中的(我的)事情;(我的)看法,也是语言文字中的(我的)看法。(我的)事情、(我的)看法都在语言文字中得以存在、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事情、(我的)看法不再是事实上的了;而且,这个“我”,也不再是事实上的了,是语言文字中的了;是话在说我,而不是我在说话。人与事情借助语言文字相传,正所谓:人以文传。有些西方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你以为是在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当然,这是一些哲学家强调语言文字的哲学意义所致;不过,这些讨论应该被局限于语言文字的范围之内。

在对事情经过的描述之外,之所以还要再讲些自己有关的看

法，这大概是搞哲学的人与搞文学艺术的人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文学艺术崇尚其观点倾向性在对事情经过的描述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搞哲学的人则往往不仅强调突出自己的观点倾向性，而且还着意对自己观点倾向性进行条分缕析，甚至于构筑成某种体系。然而，在这方面也有不以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地方，那就是在哲学家强调、着意某些东西的同时，另一些东西仍然会出乎意料地、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哲学在文学艺术那里的确能找到可借鉴之处。哲学的诗化，或者提倡一种诗化哲学，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依据。

不论是对(我的)事情经过的描述，还是讲自己有关的看法，都着眼于说、写那些自己最直接的亲身体验，即那种被触动、被惊醒、被激活、被改变的自我的最原始状态，那些常常被人们遗忘、不顾、残缺的生存和生命的事实，那种最本真的事实所不可避免的出人意外、突发性、自然而然、无序、无止、非连续、局部、零碎、残缺不全，及其在哲学话语中被重建或解构的最原初过程。尽管从哲学史上来看，几千年以来哲学已经成为其不断更新的专用话语的构成物，并且形成了某些构成的特定方法、范式和程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构成的特定方法、范式和程序，“哲”便成了一种学术、一门学问，一种“学”；没有这些构成的特定方法、范式和程序，“哲”无以成“学”。但是，对于上述的最直接的亲身体验、最本真的事实和最原初过程却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因为其中有哲学的生命及其源泉在，有能持续突破哲学已有的专用话语及已构成的特定方法、范式和程序的伟力在。究其根源，M. 海德格尔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在黑森林里的邻居老太太，正是因为她贴近生命之源，她的话尽管没有哲学的专用话语及构成的特定方法、范式和程序，却说出了那种对于哲学而言是最直接的亲身体验、最本真的事实和最原初过程；而这些话，囿于书斋、学府的博士、教授们却往往讲不出来，那些事实、过程和体验，也是他们所无法顾及的或遗忘了的、丢失了的。